

制度型开放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重构

胡再勇

摘 要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中国以大口徑外循环为主的贸易格局难以为继，加之中美战略竞争激化，美国拉拢盟友和伙伴在经贸、科技、金融、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领域对华实施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举措，成为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面临的主要国际风险。在这种局面下，无论是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破除美国联合其盟伴构建的“筑墙设垒”“脱钩断链”等经贸包围圈，还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都亟需重构对外经济关系。2018 年底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提出部署实施制度型开放，为中国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中重构对外经济关系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实现路径。其理论逻辑在于，通过制度型开放，提升制度比较优势、贸易竞争优势和国际贸易福利效应。当前，中国通过制度型开放，积极从双边、多边和区域推进全球经贸规则变迁，推进中国贸易结构升级、贸易伙伴关系变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发展。为应对全球经贸规则重塑和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中国应以制度型开放为抓手，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新兴领域制度型开放，推进与“中间地带”的制度型开放合作，因应美国制度霸权的遏制与打压。

关键词 制度型开放 国际经贸规则 中美战略竞争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 数字贸易

* 胡再勇，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教授（北京 100037）。

** 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创新项目“美国对华战略转型下的中美经贸关系与中美关系研究”（项目编号：3162019ZYKA03）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也是外交学院“双一流”建设学科（政治学）“经济外交”交叉创新团队成果。论文写作得到团队的大力支持，谨此致谢。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有效需求不断减少,美欧同时提出了不同形式的制造业振兴计划,促进制造业回流,中国以大口径外循环为主的贸易格局难以为继。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拉拢盟友和重要伙伴,在经贸、科技、金融、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领域对华实施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措施,频频冲击中国底线,撞击中国红线,目的是限制中国经济增长、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维持美国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是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面临的主要国际风险。巨大的国际风险挑战和压力,甚至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可能重回闭关锁国的忧虑,在这种局面下,无论是坚持对外开放的既定国策,将大口径外循环调整为高质量的国际国内双循环,还是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破除美国联合盟友和伙伴推动的对华“筑墙设垒”“脱钩断链”,中国都亟需重构对外经济关系。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①中国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②这就提出了一个很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课题:如何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中重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2018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③应该说,推进制度型开放这一战略部署为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重构对外经济关系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实现路径,契合了经济全球化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发展大势,也有利于中国充分利用开放倒逼改革的作用机制,重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但仍然有一些基本问题需要澄清:制度型开放的国际经济背景是什么?制度型开放的政策意涵和理论逻辑是什么?制度型开放对新形势下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有哪些作用?以制度型开放重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路径是什么?本文尝试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①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社,2018 年 4 月 10 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18-04/10/content_5281320.htm;习近平:《开放合作,命运与共——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 年 11 月 6 日,第 3 版;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16 日,第 2 版。

② 习近平:《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 年 10 月 8 日,第 3 版;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12 月 19 日,第 1 版。

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8 年 12 月 21 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18-12/21/content_5350934.htm。

一、制度型开放的国际经济背景

制度型开放具有深刻的国际经济背景，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全球贸易结构性变化趋势明显，二是旧有的经贸治理机制失灵，三是中美经贸规则之争全球化。

（一）全球贸易结构性变化趋势明显

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兴领域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全球贸易的结构性变化。一是传统贸易增速下滑。次贷危机发生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叠加贸易保护主义、俄乌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冲击，全球商品贸易相对前一个时期大幅下滑，2012—2022 年全球出口和进口年均增长率相比前 10 年分别下降 2.80 个百分点和 2.68 个百分点。^① 二是新兴领域贸易增长显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互联网和相关技术的发展使得服务的可贸易性增强，服务贸易在总贸易中的比重上升趋势明显。2012—2022 年，服务贸易年均增长率为 4.26%，比商品贸易年均增长率高 1.14 个百分点，部分年份增长率甚至达到两位数，如 2021 年和 2022 年增长率达到 17.56% 和 14.80%，在总贸易中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19.38% 上升至 2022 年的 21.15%。^② 其二是互联网革命催生了数字经济等一系列新经济形态的蓬勃发展，作为数字经济的延伸和应用，数字贸易也得到迅速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为核心内容，借助现代信息网络进行传输甚至完成交易，促使传统经济活动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③，不仅包括数字产品和服务的贸易，也包括受益于互联网而实现的传统贸易。^④ 仅就信息和通讯技术（ICT）服务的贸易出口来看，2012—2021 年，ICT 服务的世界贸易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 9.83%，占世界贸易出口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7.93% 快速上升到 2021 年的 13.97%。^⑤ 三是数字贸易的发展也促进相关服务贸易的发展，使得数字服务贸易增长迅速，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大幅上升。2012 年世界数字服务贸易出口规模为 21835.36 亿美元，到 2022 年增长到 39419.25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6.09%，远高于服务贸易 4.26% 的年均增长率，使得数字服务贸易出口

① 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② 数据来自 WTO 统计数据库。

③ 孙杰：《从数字经济到数字贸易：内涵、特征、规则与影响》，《国际经贸探索》，2020 年第 5 期，第 88 页。

④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USITC），“Digital Trade in the U.S. and Global Economics, Part 2”，Publication Number 4485, August 2014, pp. 29, <https://www.usitc.gov/publications/332/pub4485.pdf>.

⑤ 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UNCTAD Stat）。

占服务贸易出口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48.12% 上升至 2022 年的 55.97%。^①

（二）旧有的经贸治理机制失灵

首先，旧有的经贸治理机制失灵表现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步履维艰。因成员在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等议题上的严重分歧，旨在促进世贸组织成员削减贸易壁垒、通过更公平贸易环境来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多哈谈判失败，而 WTO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已接近停摆。一些发达经济体另起炉灶，建立替代性的高标准区域性贸易组织，以打造有利于己的新经贸规则，攫取更多经贸利益。相对 WTO，这些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一是具有更高的标准，如更低的约束关税水平、更长的知识产权保护年限等；二是在现有 WTO 规则之外涵盖更多新规则，如全球供应链便利化、环境问题、竞争政策、政府采购和反腐败、数字贸易、透明度等；三是更加具有约束性和可执行性。^②

其次表现为新兴领域治理机制缺失。新的产业业态的出现使经贸规则需要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广，而现有的治理机制无法应对新兴领域的经贸问题，如数字产品和服务的贸易规则及争端协调问题、服务经济领域的争端协调问题。在气候治理领域，《巴黎协定》以国际条约形式确认所有缔约方“自下而上”提出国家自主贡献的减缓合作模式，推动了全球绿色经济的迅速发展，主要大国围绕低碳技术、低碳规则展开了新一轮博弈。^③为促进全球气候治理和绿色经济发展，亟需构建绿色贸易规则与争端协调解决机制。

（三）中美经贸规则之争全球化

全球经贸规则竞争新趋势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规则对等、规则一致、规则锁定和规则引领。^④其中规则对等主要涉及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投资准入，强调调整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规则一致，涉及汇率和宏观经济政策、劳工、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透明度和反腐败等内容，强调各国规则协调和监管一致性，以保护投资安全，推进生产一体化；规则锁定，涉及国有企业、补贴等内容，通过加强规则制定，推进公平竞争；规则引领，涉及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等领域，制定高标准经贸规则，发挥规则引领作用，确保未来竞争优势。

随着中美权力位置差距缩小、结构性矛盾凸显，双方战略竞争的激化态势

① 本处统计的数字服务贸易指的是数字传输服务贸易（digitally-deliverable services），数据来自 UNCTAD Stat。

② 崔凡：《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发展趋势与对接内容》，《学术前沿》，2022 年第 1 期，第 73—74 页。

③ 于宏源：《巴黎协定、新的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太平洋学报》，2016 年第 11 期，第 88、92 页。

④ 东艳：《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与中国参与路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32 页。

已不可避免。^①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印太战略报告》等涉华战略竞争官方文件的发布为标志，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关系进行了颠覆性的重新定位，展示出与中国进行全方位战略竞争的决心和政策思路。^②拜登政府上台后，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全方位强化对华遏制、打压与威慑，^③涉及经贸、金融、意识形态、军事科技、地缘政治等诸多领域。美国拉拢盟友和伙伴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中美战略博弈全球化。在中美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全球经贸规则重塑之争将是两国战略博弈的重点，而政治、科技、安全等领域的竞争将表现为全球经贸规则竞争中的战略战术。^④中美全球经贸规则之争主要体现在规则制定权和主导权之争上，美国通过与盟友、伙伴达成故意将中国排除在外的经贸协议安排，以及与中国邻国达成更高标准的经贸协议，迫使中国按照于中国不利的国际惯例行事。^⑤在规则对等和规则一致方面，随着实力下降，美国要求WTO改革解决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实现对等贸易、规则协调和监管一致性，其突出反映在中美通过双边谈判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上，涉及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度、扩大贸易等议题。^⑥在规则锁定和规则引领方面，美国在国有企业、补贴、产业政策、数字经济等议题上设定高标准，给中国加大压力，而美墨加协定（USCMA）、美日数字贸易协议（UJDTA）都包含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现了数字贸易规则的美国模式。在WTO多边贸易规则改革停滞的情况下，高标准双边和区域性经贸协议是中美全球经贸规则之争的主要载体，突出反映在USCMA、UJDT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上。中国通过制度型开放强调规制融合和规制创新以形成国际贸易中的通行规则，是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一种方向。^⑦例如，2023年6月29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下文简称《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而“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跨区域合作和经济治理新模

① 叶晓迪：《论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变化的原因》，《战略决策研究》，2021年第1期，第22页。

② 孙西辉、金灿荣：《中美战略竞争的逻辑与前景》，《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31页。

③ 吴心伯：《塑造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常态》，《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2期，第38—39页。

④ 陈定定、王悠：《全球经贸规则竞争背景下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当代中国与世界》，2021年第1期，第96页。

⑤ 夏先量：《中国“一带一路”与美国TPP在全球贸易规则上的博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550—551页。

⑥ 东艳：《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与中国参与路径研究》，第32页。

⑦ 常娱、钱学锋：《制度型开放的内涵、现状与路径》，《世界经济研究》，2022年第5期，第95页。

式，体现了适应不同发展水平的多层次贸易投资规则体系，为国际经贸合作和规则塑造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制度型开放及其理论逻辑

（一）制度型开放的政策意涵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第三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模式、路径及其主导的规则和理念越来越难以适应新阶段的发展需要，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①其突出表现在经济全球化促进国际分工深入全球价值链的要素分工阶段，国际贸易的对象向同一产品内零部件和不同工序发展，进而产生“序贯生产”的分工新形式，^②促使生产分工渗入各国境内，需要各国境内规则和制度的相容。而 WTO 多边经贸规则仍停留在边境开放阶段，侧重于促进贸易而不是生产合作，在推动各国境内制度和规则的相容方面举步维艰，这也是以境内开放为主要内容的 CPTPP、USMCA 等高水平区域性协定蓬勃发展的原因。^③第三阶段经济全球化主要促进商品和资本等一般要素的跨国流动，制度环境缺失导致人才、新技术等创新要素流动不足，制约全球产业链向创新链发展。在国际经贸规则滞后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及全球产业链向创新链发展的背景下，可以预期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必将是制度型开放。^④

2013 年以来，中国作出了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战略部署，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依托“一带一路”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举办进口博览会，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在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开放进程中，2018 年底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提出并部署实施制度型开放。在 2018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之后，2019 年 3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对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和制度型开放进行了区分，强调要“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⑤“十四五”规划进一步

① 戴翔：《制度型开放：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国际贸易》，2019 年第 3 期，第 8 页。

② 余心玓、杨军、王萼、王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间产品贸易政策的选择》，《世界经济研究》，2016 年第 12 期，第 47—59 页。

③ 戴翔：《制度型开放：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第 9 页。

④ 同上，第 8 页。

⑤ 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9 年 3 月 5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9 年 3 月 16 日，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77101.htm。

对制度型开放进行了扩展,强调“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将制度型开放从流动规则的层面扩展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层面。^①党中央和国务院部署实施制度型开放,是在深刻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做出的,一方面契合了全球经贸规则由边境开放转向边境后开放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契合了经济全球化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的发展大势,是中国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重点,也是中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抓手。

自中央文件提出“制度型开放”后,相关学术文献迅速增加。既有研究大多认为,制度型开放指的是规则的跨境融合,大致包括规则进口、规则出口和规则整合等三个层面。^②结合“十四五”规划文件和上述文献关于制度型开放的界定^③,本文认为,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中的制度型开放的政策意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来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二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新一轮开放战略和举措,向全球提供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公共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三是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中积极引领、共建和扩展全球通行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

(二) 制度型开放的理论逻辑

技术进步带来交通成本的下降以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和消除,共同促进了以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为特征的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但诸多经验分析表明,现实中的全球贸易量及其结构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预测的结果并不一致,甚至差距巨大,被称为丢失的贸易之谜,用以描述实际贸易规模明显小于理论贸易规模的现象。^④新贸易理论引入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用以解释产业内的贸易现象,而新新贸易理论则引入企业异质性,从微观层面解释国际贸易的产生机理,但这些理论仍然不能完全解释现实中的国际贸易现象,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1年3月13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② 常娱、钱学锋:《制度型开放的内涵、现状与路径》,第94—95页。

③ 东艳:《制度摩擦、协调与制度型开放》,《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86页;赵蓓文:《制度型开放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践》,《世界经济研究》,2021年第5期,第6—7页。

④ D. Treffer, “The Case of Missing Trade and Other Myste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5, No. 5, 1995, p. 1044. 张海伟、刘国华、封延会:《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分析》,《东疆学刊》,2011年第3期,第93页。

如贸易边界即国内贸易远大于国家间贸易的现象。^① 这些事实都表明，现有国际贸易理论所忽视的一些因素可能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是将制度外生或者给定、交易成本为零作为前提假设可能与现实情况差异较大。随着制度经济学的蓬勃发展，一些学者开始将制度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尤其是以诺斯为代表的学者，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考察制度对贸易产生作用的过程，提出制度启动贸易命题，将制度因素纳入贸易模型，使国际贸易的理论研究与现实更加吻合。^②

从纳入制度因素后的贸易理论来看，制度型开放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度型开放有助于提升制度的比较优势。制度和劳动力、资本、技术一样，都是影响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制度比技术更重要，制度是第一生产力，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因素，而生产力则是制度函数。^③ 与劳动力、资本、技术一样，制度是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它通过两种途径形成比较优势：（1）制度影响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执行成本，进而影响贸易比较优势。制度好的国家在复杂性产品的制造中具有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④ 且拥有好的合约监督机制，更能促进需要大量中间投入品的复杂性产品合约的有效执行，降低执行成本。^⑤（2）制度环境通过影响企业劳动分工和技术选择，进而影响比较优势。制度环境越完善，越有利于促进企业分工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国家，其企业越可能采用先进技术进行生产，并倾向于出口生产迂回程度较长的产品，而制度环境差的国家其企业倾向于选择非先进技术进行生产，并出口生产迂回程度较短的产品。^⑥ 因而，制度环境优越的国家具有较高生产率和国际贸易比较优势。^⑦ 制度型开放在规则进口、规则出口和规则整合进程中，提升本国的制度质量和制度环境，进而提升本国的制度比较优势。借鉴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

① J. McCallum, "National Borders Matter: Canada-U. S. Regional Trade Patter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5, No. 3, 1995, p. 622.

② 张海伟、刘国华、封延会：《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分析》，第 93 页。

③ 吴敬琏：《制度重于技术》，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年；邹东涛：《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中国科技信息》，2001 年第 5 期，第 4 页；谭忠真：《制度是最基本层次的第一生产力》，《中国工业经济》，2000 年第 6 期，第 76 页。

④ D. Berkowitz, J. Moenius and K. Pistor, "Trade, Law and Product Complexi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8, No. 2, 2006, p. 373.

⑤ Andrei A. Lvechenko,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74, No. 3, 2007, pp. 791-792; N. Nunn, "Relationship-specificity,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2, No. 2, 2007, p. 570.

⑥ 李新、王翠竹、谭桑：《制度与国际贸易关系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13 年第 11 期，第 129 页。

⑦ Acemoglu Daron, Antras Pol and Helpman Elhanan, "Contract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7, No. 3, 2007, p. 936.

赋理论，具有制度比较优势的国家应该出口制度密集型产品或者制度依赖型产品。

二是制度型开放有助于提升贸易竞争优势，包括贸易成本竞争优势、贸易效率竞争优势和贸易创新竞争优势。^① 制度型开放通过规则、规制、管理以及标准的进口、出口和跨境整合，对一国制度进行调整、完善、创新，最终提升该国制度质量并促进国内外制度的一致性，包括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宏观管理制度、对外贸易制度等。而良好的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宏观管理制度、对外贸易制度则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企业代理成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宏观管理运行成本以及国际市场交易成本。^② 此外，国内外制度的相似性也有助于促进产业链垂直分工，降低交易成本。^③ 这些境内外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助于增强一国国际贸易的成本竞争优势。制度型开放有助于提升制度质量，而制度质量差异是企业间、产业间乃至国家间效率差异的主要来源。制度质量越好、越完善，越能提高市场的要素配置效率、交易效率以及企业的生产效率。一国国内生产效率、要素配置效率和交易效率越高，则其国际贸易的效率竞争优势越明显。在全球产业链向创新链和服务领域转变的过程中，一国的制度环境越优越，越有利于聚集创新要素，提升规模创新效应，从而提高创新产出或创新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增强制度依赖型或制度密集型复杂技术产品的国际贸易竞争优势。^④

三是制度型开放有助于提升国际贸易的福利效应。制度质量好的国家能从制度比较优势驱动的贸易中获得福利增进，而制度质量差的国家则在国际贸易中遭遇福利损失。^⑤ 其基本原理在于要素市场是分割的，要素回报因行业而异^⑥，贸易的收益和损失来自要素回报较高的行业的扩张和收缩。^⑦ 制度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来源，制度质量好的国家能够专注于更理想的行业，在国际贸易中出口制

① 王涛生：《制度创新与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理论与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② 王涛生：《制度创新影响国际贸易成本竞争力的内在机理研究》，《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2期，第43页。

③ Antras Pol,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the Product Cyc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No. 4, 2005, p. 1068; H. Roelfsema and Y. Zhang, “The Causal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Outsourc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 21, No. 6, 2011, p. 896.

④ 王涛生：《制度创新与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理论与实证研究》。

⑤ Andrei A. Lvechenko,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 792.

⑥ Calballero Ricardo and Mohamad Hammour, “The Macroeconomics of Specific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6, No. 4, 1998, p. 724.

⑦ Haber Gottfried, “Some Problems in the Pur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60, No. 238, 1950, pp. 224-225; Hagen Everett, “An Economic Justification of Protectionis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72, No. 4, 1958, p. 505; Bhagwati Jagdish and V. K. Ramaswami, “Domestic Distortions, Tariffs and the Theory of Optimum Subsidy”,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1, No. 1, 1963, pp. 46-48.

度依赖型商品，对应的行业由于存在贸易竞争优势，回报较高。贸易开放后，制度质量差的国家的对应行业消失，制度质量好的国家的高薪行业扩大以满足整个世界的需求，在贸易中获得的福利增进超过传统要素丰裕度差异所隐含的福利收益。^① 制度型开放通过提升一国的制度质量，有助于提升一国国际贸易的福利效应。

总体上看，制度型开放通过提升制度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优势，扩大贸易流量，促进产业链向创新链转变，增强制度依赖型或制度密集型复杂技术产品的国际贸易竞争优势，提升国际贸易的福利效应。

三、制度型开放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

通过制度型开放，中国积极推进全球经贸规则变迁，贸易伙伴关系变化，贸易结构升级，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发展。

（一）推进全球经贸规则变迁

当前，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正逐步演变，呈现一些新特点。一是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重要载体，多边贸易谈判举步维艰，国际经贸规则推进方式转变为先在双边和区域内达成经贸规则，再逐渐推广至多边层面。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等传统国际经贸规则议题不断深入，各国正在用负面清单规则取代正面清单规则，将准入后国民待遇转变为准入前国民待遇，以进一步扩大在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开放水平。^② 三是经贸议题由边境逐步向边境后延伸，目的是协调各国国内政策，实现各国在环境产品、劳工问题、知识产权、监管规则上的一致性，协调宏观经济和汇率政策，对国企、补贴等问题进行规制，约束非市场经济行为。四是一些国家追求在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规则引领作用，如通过《美日数字贸易协议》等构建高标准新规则，确保本国未来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竞争优势。可以看到，在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演变中，竞争兼顾自由、公正成为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核心理念，而竞争中立则成为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内容。^③

因应全球经贸规则演变新特点，中国在双边、多边和区域层面积极推动全球经贸规则变迁。一是推动 WTO 新议题设定和讨论，引领多边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投资便利化协定》是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主动设置、积极引领谈判的首

① Andrei A. Lvechenko,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 792.

② 岳文：《积极应对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加快推进中国制度型开放》，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 年 11 月 20 日，http://www.cssn.cn/jjx/jjx_jjxp/202211/t20221121_5565497.shtml。

③ 同上。

个议题，于2022年12月16日实质性结束文本谈判。^①中国还在世贸组织积极推动启动《服务贸易国内规则参考文件》的生效程序、推动WTO在世贸组织改革、知识产权、粮食安全、电子商务、渔业补贴等众多议题上取得多项成果，其中《渔业补贴协定》是世贸组织过去九年达成的首份多边协定，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重要贡献。^②中国围绕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提交提案，提议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监督审议职能，就对贸易影响重大的环境政策开展多边专题讨论。^③通过积极引领多边经贸规则制定，中国支持世贸组织改革，维护世贸组织协商一致原则，反对单边主义，推动国际贸易体制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是积极参与区域和双边自贸协定谈判，提高制度性话语权。中国已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19个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另外10个。^④在协定谈判中，对于关税减免、电子商务、投资自由化、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等议题，中国积极推进协定与国际标准相衔接，推动国内国际规则相融合，对于数字贸易、知识产权、服务贸易、高科技、公平竞争等制度性竞争较强的领域，则积极开展对话与竞争，提高中国经贸规则制定的制度性话语权。^⑤

当前，亚太地区正成为大国数字规则博弈的焦点。2015—2021年，全球共有45个特惠贸易协定包含数字贸易条款或章节，涉及5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太地区表现最活跃。^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安全与开放并重，一方面相继出台保障网络安全、宏观数据安全、微观隐私安全的法律法规，搭建信息数据监管的法律框架，另一方面，通过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充分发挥示范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数字贸易开放水平的有序提升。^⑦在签订贸易协定时，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于数字贸易开放不盲目照搬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如RCEP涉及的数字贸易规则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与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存在较大差距（见表-1）。

① 林子涵：《中国捍卫多边贸易体制展现大国担当》，《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12月31日，第6版。

② 同上。

③ 陈斌杰：《中方在世贸组织提交贸易与环境政策相关提案》，新华网，2023年6月20日，http://m.news.cn/2023-06/20/c_1129707504.htm。

④ 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http://fta.mofcom.gov.cn/index.shtml>。

⑤ 岳文：《积极应对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加快推进中国制度型开放》。

⑥ 刘斌、崔楠晨：《数字贸易规则与中国制度型开放：未来向度和现实进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2期，第33页。

⑦ 同上，第35页。

表-1 数字贸易领域开放的差异

核心议题	主要内容	USMCA	UJDTA	CPTPP	DEPA	RCEP
数据的跨境传输与管理	跨境数据自由流动	√√	极少数例外	√√	√	√
	计算设施非强制本地化	√√	极少数例外	√√	√	√
	接入和使用互联网开展电子商务的原则	合理管理	合理管理	合理管理	合理管理	未涉及
数字产品与服务	国际数字传输免关税	√√	√√	√√	√√	√
	国内开征数字服务税	基于非歧视原则	基于非歧视原则	未涉及	未涉及	未涉及
	给予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	√√	√√	√√	√	未涉及
数字知识产权保护	源代码非强制本地化	√√	√√	√√	未涉及	承诺进一步开展对话
	加密技术的保护条款	√√	√√	√√	√	未涉及
	交互式计算机服务	√√	√√	未涉及	未涉及	未涉及

注：（1）本表来自刘斌、崔楠晨：《数字贸易规则与中国制度型开放：未来向度和现实进路》，第 36 页。本文做了适当修改。

（2）√√为硬约束，表示该条款包含少数例外条款，且可强制执行；√为软约束，表示该条款不具有约束力或约束力较小。

三是推进“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为全球提供包括贸易投资规则在内的发展规则。在自由公平贸易和边境后开放成为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演变重要特点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通过推进机制化建设并与沿线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在促进市场准入、劳务、知识产权、公平贸易、项目和贸易融资等规则制定权利共享的同时，推进“一带一路”制度型开放，促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的进口、出口和跨境融合，发展适应不同发展水平的多层次贸易投资和发展规则。

（二）推进贸易伙伴关系变化

制度型开放推动中国与贸易伙伴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一致化和高级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交易成本降低、产业链供应链基本稳定基础上的分散化，进而推进中国贸易伙伴关系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基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RCEP、“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制度型开放，中国出口目的地分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东盟国家、RCEP 中除东盟外的其余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贸易增量的贡献持续增加，成为中国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伙伴。

2013—2022 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年均增长率为 9.15%，远超中国与欧

盟 4.73% 以及中国与美国 4.28% 的年均增长率。2013—2018 年, 欧盟、美国、东盟是中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高速增长使得东盟在 2019 年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2020 年反超欧盟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此后, 东盟、欧盟、美国一直是中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 且东盟的地位越来越重要。^①从具体国家来看, 东盟的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与中国的双边贸易超过 5000 亿元人民币, 成为中国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伙伴。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 RCEP 签署以来, 中日韩首次建立自由贸易关系, 推动韩国、日本在中国贸易伙伴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就单个国家来看, 2022 年, 韩国、日本分别位列中国第二大和第三大贸易伙伴。

2013—2022 年,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由 1.04 万亿美元扩大到 2.07 万亿美元, 年均增长 7.95%, 远超同期中国 5.57% 的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 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在中国贸易伙伴中的地位迅速上升。^②

(三) 推进贸易结构升级

制度型开放提升贸易竞争优势, 尤其是贸易创新竞争优势, 增强制度依赖型或制度密集型复杂技术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 推动向全球产业链高端攀升, 从全球产业链向创新链和服务领域转变, 进而推进贸易结构升级。

在贸易方式上, 随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攀升, “三来一补”在中国贸易中的比重相对下降, 而一般贸易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2012 年, 一般贸易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为 51.98%, 到 2022 年, 一般贸易占比升至 63.76%, 上升 11.78 个百分点。^③

从产品结构来看, 中国贸易产品结构持续优化。2012—2022 年,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年均增长率为 6.28%, 超过同期中国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 0.71 个百分点, 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45.24% 上升至 2022 年的 49.12%。此外, 2012—2022 年, 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平稳增长, 年均增长率为 6.17%。部分新能源产品、高附加值产品, 如电动载人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出口增长迅猛, 2020 年以来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170.2%、50.1% 和 76.3%, 引领中国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升级。^④

(四)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发展

自 2013 年在上海建立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来, 中国已陆续建立了 21 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 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基本形成。自由贸易试

① 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统计月报。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制度型开放为建设重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先行先试”反映了国际生产方式变革需求的贸易投资新规则，在统筹开放与安全的基础上，一方面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国内规则国际化进程，借助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双边和多边谈判与互认，促进国内制度出口和跨境对接融合。2023 年 6 月 29 日出台的《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包括推动货物贸易创新发展、推进服务贸易自由便利、便利商务人员临时入境、促进数字贸易健康发展、加大优化营商环境力度、健全完善风险防控制度 6 个方面 33 条，其中很多条款已经接近 CPTPP 等高标准国际经贸协定的经贸规则要求。

四、以制度型开放重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路径

在国际经贸规则面临重塑、制度型开放成为新一轮全球化重要特征的背景下，我国应以制度型开放为抓手，从体制、内容和布局等方面重构对外经济关系，应对日趋激烈的中美战略竞争。

（一）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2023 年 7 月 11 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①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国以开放促改革，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也是我国加快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主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抓手。

在经济全球化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以及开放措施正由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延伸的背景下，当前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还存在不少问题，突出体现在贸易、投资、金融、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领域，与高标准国际规则存在较大差距：与零关税的国际高标准货物贸易规则相比，我国货物贸易零关税无论是实施地区还是产品适用范围还存在较大不足；在电信、物流、医疗、文化等外资投资意向强烈的领域市场准入限制仍然较多；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机制、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等相关投资机制建设还需进一步完善；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与我国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程度尚不匹配。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李强王沪宁蔡奇出席》，《人民日报》，2023 年 7 月 12 日，第 1 版。

在高水平开放创新制度、开放创新生态合作平台、一流的开放创新生态服务体系、一流的营商环境等方面，与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目标尚存在较大距离。此外，在国有企业竞争中立、产权保护等现代治理体系方面，我国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也存在较大差距。

未来，我国应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将对接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和推进市场化改革结合起来，在《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基础上，以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三零原则”为导向加快推进货物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以《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及商务部即将出台的《自贸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和《全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为抓手，逐步削减清单目录。完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机制和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对照 USMCA、CPTPP 等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契合竞争中立的国际经贸规则重塑，在企业内部推进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建设，提高信息透明度尤其是成本透明度，在企业外部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逐步减少各种优惠补贴措施，包括税收优惠、贷款担保融资优惠、资源垄断等，促进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以契合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中的知识产权条款，强化空白或薄弱领域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应用。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和创新生态。通过建立健全高水平国际贸易体系、双向投资管理体系、现代金融治理体系和高水平开放创新生态体系，构建适应内外部环境新变化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二）推进新兴领域制度型开放

扩大制度型开放的重点是抓好并利用新兴领域国际经贸规则塑造的契机。一方面，在统筹开放与安全的基础上，主动对接新兴领域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加快推进国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和国际接轨。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新兴领域国际经贸规则的讨论和制定，不断增强新兴领域经贸规则的话语权，基于新兴领域制度开放和改革经验，提出国际制度规则的中国倡议、主张和方案，把握新兴领域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主动权。

对于数字经济，中国应以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为主要措施，以申请加入 DEPA 和 CPTPP 为契机，在统筹开放与安全的基础上，在条件成熟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 DEPA、CPTPP、UJDTA、USMCA 等高标准数字经济规则，为以制度型开放为导向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数字经济自由贸易区网络打下基础。对于数字经济中的电子商务、跨境电商、移动支付和其他新兴领域，如新型基础设施、共享经济等，中国发展势头较好，也具有相对发展优势，应总结相关制度建设经验，主动参与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一是借助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双边和多边谈判与互认，促进这些领域国内制度出口和跨境对接

融合；二是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在电子商务、跨境电商、移动支付、新型基础设施、共享经济等新兴领域的议题设定和讨论，引领多边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对于绿色贸易，目前 WTO 多边国际贸易规则缺失，一些国家和地区则在争夺绿色贸易国际规则的主导权。随着碳中和目标的实施，贸易政策与环境政策不断加深融合，部分地区或国家制定的环境政策已突破环境治理的范畴，涉及市场准入、绿色产业链、政府补贴以及国际贸易中的碳泄漏等更深层次问题，对国际贸易影响重大，如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对于绿色贸易规则，中国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通过议题设定、磋商和讨论，在贯彻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围绕零碳技术转让、清洁能源、碳泄漏等关键问题积极推动构建和制定多边绿色贸易规则，为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贡献；二是应和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共同推动加强 WTO 贸易与环境委员会的职能，就对贸易影响重大的国家或区域性绿色贸易政策开展多边专题讨论，以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的监督审议职能，推动国际贸易体制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前进；三是应在 WTO 中通过议题设定和讨论、在区域和双边通过谈判，积极输出相关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提升中国在国际绿色贸易规则制定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中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一揽子政策、行动和保障体系已基本形成，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平稳运行，光伏和电动汽车出口高速增长，为形成和输出碳中和治理的“中式模板”提供了基础。

（三）推进与“中间地带”的制度型开放合作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在相当大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竞争战略，积极渲染中国威胁，威逼利诱其他国家共同对抗中国，强迫其他国家在美之间选边站队，夹在中美之间的“中间地带”正在形成。“中间地带”理论是毛泽东在 1946 年 8 月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来的，是指导新中国外交的重要理论。^①“中间地带”理论将大国竞争看作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演进的主导力量，一旦大国竞争格局出现，“中间地带”将会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区域。^②“中间地带”通常既带有自然属性也带有社会属性，指的是在大国或国家集团之间存在的规模和实力不等的国家或区域，大国双方都会竭力将“中间地带”转变为支持己方的力量，而“中间地带”也会利用与大国的合作契机发展壮大自己。

①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193—1194 页。

② 滕建群、韦洪朗：《论“中间地带”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含义》，《和平与发展》，2021 年第 5 期，第 2 页。

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格局基本形成，对“中间地带”的争夺将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内容。针对美国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中国也存在一些优势：一是绝大部分国家或地区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欧洲国家总体上追求战略自主，东盟国家对中美开展平衡外交，韩国、印度都希望保持独立的外交政策；二是中国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不在中美间选边站队符合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三是在非洲等非美国外交优先方向的地区，中国通过长期务实合作和大规模援助占据重要地位，美国难以匹敌。

为了应对美国对“中间地带”的拉拢，中国可以着重推进与“中间地带”的制度型开放合作，扩展合作机制和领域，强化贸易和投资联系，稳步提升彼此之间的关系，有效推进贸易和投资市场多元化，规避美国对华“脱钩断链”带来的风险。一是借助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双边谈判与互认，促进中国与“中间地带”制度进出口和跨境融合，推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二是积极推进与“中间地带”签订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投资协定，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动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升级；三是推进中国与“中间地带”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新型基础设施以及战略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合作，引领这些领域高标准国际规则的制定；最后，推动中国与“中间地带”在联合国、WTO、IMF、G20、上合组织、金砖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中的制度型开放合作，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传染病、网络空间安全、地区动荡等全球性问题的机制建设，共同推进全球治理，维护多边主义。

（四）因应美国制度霸权的遏制与打压

自对华实施竞争战略以来，美国凭借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and 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基于制度霸权通过国际、区域性组织乃至直接采取单边行动对中国实施全方位遏制和打压，意在放缓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长，维护美国霸权地位。

科技、经贸、金融领域是中美竞争的主战场。^①在科技领域，为了竞赢中国，美国一是加大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新兴技术领域的投资，确保美国技术领先优势；二是采取“小院高墙”策略，加大技术封锁，在关键领域与中国“脱钩”，颁布 AI 芯片禁令、全面断供中国云服务、阻止中国从贸易伙伴获得先进技术，制裁特定中国科技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签署“对华投资限制”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对中国敏感技术领域的投资；^②三是

① 吴心伯：《拜登执政与中国战略竞争走向》，《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第42页。

② “Executive Order on Addressing United States Investments in Certain National Security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in Countries of Concern”，The White House，August 9，2023，<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3/08/09/executive-order-on-addressing-united-states-investments-in-certain-national-security-technologies-and-products-in-countries-of-concern/>。

组建技术联盟，在半导体、5G 通信、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以及技术标准等领域对中国进行限制，如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构建排除中国的半导体供应链体系。在经贸领域，加强与中国竞争，一是主导制定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掌握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生物技术、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知识产权等领域的规则话语权，通过高规则门槛打造对华经贸围堵圈，加紧布局“印太经济框架”；二是在多边机制中推进对华竞争，通过规则制定和议程设置打压和限制中国，如在 USMCA 纳入排他性条款，干扰世贸组织总干事和仲裁庭法官人事任命；三是阻挠中国主导或参与的双多边合作倡议，干扰“一带一路”倡议、东亚合作、欧亚合作等。在金融领域，美国通过《外国控股公司责任法》限制中国企业在美上市融资，迫使中概股退市，对中国实体机构和个人实施金融制裁，限制美国资金投资中国股市。

因应美国制度霸权的遏制与打压，中国应以制度型开放为抓手，从国内、双边和多边层面采取应对措施。在国内层面，通过制度型开放，配合深化改革，引入国外先进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聚集创新要素、推进高水平科研创新提供制度激励和保障，构建新发展格局，催生新发展动能，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进一步提升中国综合国力，构筑新形势下对美战略博弈立足点。双边层面是应对美国制度霸权遏制和打压的重要发力点，通过制度型开放，推进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一致化和高级化，降低交易成本，紧密经贸联系，促进高标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的签署与升级，提升中国与伙伴国之间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韧性。基于与贸易伙伴间的紧密经贸联系，推动双边货币互换、人民币贸易融资和结算安排，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削弱美元霸权及其负面影响。多边层面则是应对美国制度霸权遏制和打压的支点，应以实际行动积极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各方共同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使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的方向发展。

（责任编辑：李 丹）

FOREIGN AFFAIRS REVIEW

Bimonthly Volume 40 Number 5 2023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and Restructuring of China's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HU Zaiyong

Abstract: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economic growth of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continued to slow down, and China's dependence on a trade pattern dominated largely b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 has been difficult to sustain. In addition,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united allies and partners to implement a series of aggressive measures against China in areas such as economy and trade, technology, finance, ideology and geopolitics, which has become the main international risk China faces in a new round of high-standard opening up. In this situation, it is imperative and urgent for China to restructure its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so as to cope with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o break through the economic and trade encirclements by the U.S. and its allies through erecting "fences and barriers", decoupling, and disrupting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and to foster a new pattern of development featuring positive interplay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lows. Since the end of 2018,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have repeatedly proposed and deploy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which has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and path for China to restructuring its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new round of high-standard opening up. The theoretical logic lies in enhancing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trad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welfar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rough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China is actively promoting changes in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at multilateral, bilateral, and regional levels, upgrading its trade structure, adjusting trade partnerships, and advancing high-standar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rough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In response to the reshaping of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should remain anchored in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build an open economy of higher standard, promote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in emerging fields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intermediate zones", and respond to the containment and suppression of the U.S. as an institutional hegemon.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China's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digital trade

The Adjustment of U.S. Hegemonic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Sino-U.S. Relations

ZHAO Minghao

Abstract: The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is a multi-dimensional game of material, network and conceptual power. It is also a contest of strategic reflection and adaptation capabilities of relevant parties. Compar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merican hegemony is in relative decline. The United States has sought to renew itself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hegemon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deepened its rivalry with China, in which context the U.S. hegemonic renewal has become more prominent and closely linked to U.S. strategy toward China, where investment, alliance, and competition are the core element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put forward the "New Washington Consensus" that aims to strengthe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innovation competitiveness of the U.S. and to consolidate the material power base of its hegemony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strateg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vigorously constructed a composite system of allies and partners to enhance the relevance, flex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alliances by means of issue-based and minilateralist arrangements. It also draws geopolitical linkage between the Indo-Pacific and Europe to strengthen the network power that supports the hegemonic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democratic backsliding has eroded the conceptual power that underpins U.S. hegemony, an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seeks to repair democracy and respond to social injustice in the digital age by, among other things, safeguarding voting rights. The renewal of U.S. hegemony will inevitabl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ino-U.S. relations. It should also be recogniz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ces many limitations and adopts conflicting approaches for its hegemonic renewal in different areas. China needs to confront the long-term and complex Sino-U.S. strategic game in a confident, prudent and sophisticated manner.

Key words: major power competition, U.S. hegemonic strategy, modern industrial strategy, a composite system of allies and partners, Sino-U.S. relations

Partnership: A New Path to Building a New Mode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aking China's Partnerships with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s an Example

HUANG Bing

Abstract: Deepening and expanding global partnership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which is worthy of theoretical study. The mainstream of 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holds that alliances are the main path to cooperation for security. Yet why is China actively developing partnerships rather than alliances? How do partnerships work? Based on the